

貨幣、貿易與經濟成長

侯家駒譯

貨幣、貿易與經濟成長

侯家駒譯

貨幣、貿易與經濟成長

65. 8. 0144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第二次印行
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定價新臺幣八十元

譯 者 侯 家 駒
發行人 王 必 成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5 號
電話：7683708・7678738
郵政劃撥帳戶第 100559 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130 號

55006



作者原序

這本書要溯源到國際經濟學會與巴基斯坦經濟學會，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在喀拉蚩聯合主辦的「巴基斯坦經濟學家進修課程」(the Pakistan Refresher Course for Economists)。於此課程中，Carl Kaysen 教授與本人試圖在五次講演中，檢討經濟理論的現代發展。我的講演——很遺憾的，不是 Kaysen 教授的講演——於後來從錄音中整理出來，發表於「巴基斯坦經濟學報」(*Pakistan Economic Journal*)。用這些講義教學的同事們，發現這些講義很有用處，乃鼓勵我使之廣為流傳。其中四篇是重印於本書之中（第一、二、五、七章）；第五篇講稿，是來自 Radcliffe Report 以及貨幣與信用委員會報告，今天重讀時似乎太悲觀，已不值得保留下來。在作重印準備時，只為澄清論點所需才予以修訂，然後，加上本人在講演中所引用的書籍與論文，作為參考資料。

本人也已將一九五八年於較為延伸的「巴基斯坦進修課程」中的兩個講義，置於本書之內（第三、四章）——該次課程是在 Murree 舉行，仍由上述二學會聯合主辦。對於前一個講義，作者增加了有關關稅同盟之幾何分析，這是作者於「印度經濟學報」

(*In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發表的兩篇短文之修訂文字。第二個講義是以修正的面目，出現於本人應邀於一九五九年春，在哥本哈根的兩次講演之中；因為這篇講義比另一篇，更遵循我以前工作的綱要，所以，我增加了有關貿易與成長的晚近論著之目錄——這是 Herbert F. Wass 爲我準備的，以代替內容本身更爲延伸的目錄性短文。

最後，本人把最近的三篇論文收在本書之內(第六、八、九章)。對於凱因斯「一般理論」的批判講演，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應美國經濟學會邀請，於聖路易市的年會上發表的；此講稿加以修訂與補充，並增添「年會論文集」(*Papers and Proceedings*)因篇幅所限而犧牲的參考資料。「豐碩的政治經濟學」是於一九六〇年六月，在京士頓舉行的加拿大經濟與政治學會之年會上宣讀過；這是本人以前受到英國若干大學聽衆考驗的意念之最後形式。「豐碩社會的社會政策」——爲前者續篇——是於一九六一年五月在渥太華舉行的加拿大福利委員會第四十週年會議上，發表的公開演說。

本人曾經說過，本書內容是檢討的講義，這是意謂，它們旨在以短小的篇幅評論廣泛的主題。其目的猶之乎是要引起對地形的顯著特徵之注意，而不是對它提供詳細的地圖。這種努力必然是印象上的，而且密切地受個人評斷的適切性與顯著性所支配。我相信這些限制將會受到讀者們之理解。

在技術上說，第八第九兩章並非講稿；也和拓展現行知識的

其他各章無關。但是，它們和其他各章有一共同點，那就是用口語方式寫出，而且它們試圖檢討廣泛範疇的意念。雖然方式不同，但它們都關涉到一種經濟理論的形成，此理論對於Galbraith所謂的「富裕的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問題是適切的——於此富裕社會中，有成功的支持性經濟成長。經濟學家闖入社會福利工作與政策的領域，對於北美洲（但非英國）的讀者們來說，也許感到奇怪；儘管如此，作者深信，就經濟分析的有趣與有結果的應用而言，這將成為日益重要的領域。

對於下列刊物的主編，本人應作通常的感謝：*the Pakistan Economic Journal*, *The In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National konmiskl Tidsskrift*,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及 *the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感謝他們允許本人以前在其刊物上發表的文字，重印於本書之內。

女王大學經濟研究所
加拿大安大略省京士頓市

Harry G. Johnson
一九六一年七月

⊙ 本人用「豐碩」代表「富裕」的理由，是放在第八章內，自從這一講義達到其最後形式以來，本人發現，Galbraith在更為限制的內涵上，使用這個相同的名詞。在「美國資本主義」（*American Capital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一書的第八章（101至114頁）——主要是討論商業廣告，標題為「不合式豐碩經濟學」（*The Unseemly Economics of Opulence*）。

目錄

作者原序	1
第一篇 貿易與成長	1
第一章 國際收支餘額	3
第二章 比較成本與商業政策	17
第三章 關稅同盟經濟理論	37
附錄：馬先爾學派對關稅同盟的分析	54
第四章 經濟發展與國際貿易	67
附錄：有關貿易與成長的最近論著目錄	93
第二篇 貨幣	101
第五章 貨幣理論與凱因斯學派經濟學	103
第六章 二十五年後的「一般理論」	123
第三篇 經濟成長	149
第七章 經濟發展中的設計與市場	151
第八章 豐碩的政治經濟學	165
第九章 豐碩社會的社會政策	183

第一篇

貿易與成長

第一章

國際收支餘額*

在以往二十年中，在理論上處理國際收支餘額問題與調整機能的方法，業已有很大的變化。在一方面，這是連結到凱因斯革命，導致理論的形成，是用不均衡來表達，而不是用均衡表達之；但在另一方面，這是連結到國際收支餘額問題的流行，尤其是戰後。很簡短地說，這種變化業已從調整機能的意念，演變到把國際收支餘額意念作為政策的問題。

於古典理論中，國際收支問題是經由自動調整制度，趨向國際收支的均衡。且看兩個事例：第一個事例是純金本位，此處的調整是經由自動而自由的黃金流量，提高某一國家的利率，但卻降低其他國家的利率，是以減少與增加需求和物價水準，而把它們帶到均衡；第二個事例是另一極端的不兌現紙幣，此處的調整，是經由可清理市場的匯率變動。在這兩個制度裏，金融當局與經濟當局的決策與行動，是視為制度的一部份，舉個例來說，金本位下金融當局所採的行動，是包括在自動調整機能之內。在

* *Pakistan Economic Journal*, VIII. No. 2, June 1958, 16—28.

過去二十年內，我們是從自動而自由的調整機能觀點，移動到視國際收支餘額為政策問題的觀點，因而擬訂分析，於此分析中，我們構成模式，以展示持續的不均衡——這個情況是容許我們研究，矯正國際收支餘額不均衡的各種途徑。這些模式的建立，業已促進和容許，在低度就業和充分就業的兩種條件下，作國際收支餘額問題的研究。

由自動制度變為政策問題方法，並非凱因斯革命的立即結果。在緊接着凱因斯革命後的期間，把凱因斯意念應用到國際貿易理論上，大部份是建築於古老的調整機能之架構內。例如對外貿易乘數理論的發展，是為着看看，在均衡受到擾亂之時，凱因斯的所得與就業變易之機能，將如何操作以恢復國際收支餘額上的均衡。同樣地，其他一九三〇年代的延伸凱因斯學派分析——諸如羅賓生夫人^①的分析是考慮到所得與就業變易，在古典調整機能架構中的任務。

政策導向模式的發展，是戰後的發展，此發展尤其是由於 Meade 與 Tinbergen 二教授的領導。（我並不是意味，其他作者對這個主題沒有重要貢獻；而是因為這兩位作者所寫的書籍，明確地涉及這一問題，其他作者則主要將他們自己限制在論文裏）。Meade 於「國際收支餘額」^②中，基本上是關心，充分就業與國際收支均衡等要求間的衝突，以及調和它們的手段。在另一方面，Tinbergen 於其「經濟政策理論」^③一書中，是考慮到更為一般性的問題，那就是使用一系列的政策工具，以達成很多政策目標。經濟政策重要性的一般觀點——出現於此二作者的

① Joan Robinson, *The Foreign Exchanges*, in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mployment*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7), 183—209.

② J. E. Meade,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Volume I: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③ J. Tinbergen,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Policy*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 1952).

著作裏，是每一政策目標需要各別的政策工具。舉個例來說，爲着要同時達成充分就業與國際收支餘額均衡——用 Meade 的名詞來說，同時保持內部與外部平衡，一個國家必須要既使用對其總支出的某些控制工具，又使用對其國際貿易的某些控制工具（匯率或貿易限制）。本人將在稍後對這一點予以發揮；此處，我只要揭示涉及的一般性理論觀點，那就是，針對每一政策目標，你需要一個政策工具。

在其分析過程中，Meade發展出一種國際收支餘額問題的研究方法，此方法要比以前使用的凱因斯分析，更能適合戰後充分就業條件。不幸得很，這一方法的最有用方法，是爲 Meade 的習慣所隱蔽——他是慣於假設，政府追求合宜的內部控制政策，而沒有觀察，如果政府未能維持穩定物價下的恰到好處之充分就業，會有甚麼情形發生。此方法及其涵義，在 Sidney Alexander 的「貶值對國際收支餘額的效果」^④一文中，得到更充分的發揮。Alexander 的分析方法——被稱爲「吸收法」（“the absorption approach”）——最近受到 Fritz Machlup 教授的嚴厲批評，而 Machlup 是防衛貶值方面的「彈性法」（“Elasticity approach”）^⑤。本人對這件事的看法，乃是就國際收支餘額問題而言，吸收法比這特別爭辯中出現的方法——尤其在同一篇文章中看到 Meade 的著作之時——更有一般性用途。在下面，將用這一研究方法，綜合國際收支餘額問題的一般性處理，而特別強調政策問題。

在開始，回想一下是有用的，所回想的，乃是國際收支餘額

④ S. Alexander, 'The Effects of a Devaluation on a Trade Balanc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 II, No. 2, April 1952, 263—87.

⑤ F. Machlup, 'The Analysis of Devalu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XLV, No. 3, June 1955, 255—78.

問題的存在，是假設金融當局干涉外匯市場，釘住匯率，使用官方黃金或外匯準備來這樣做。這會容許此國其餘部份為支付在海外購買的（不包括金融當局）對外匯需求，與在海外售貨而想獲得本國通貨的外匯供給之間，發生分歧。

通常處理國際收支餘額的方法，是把它視作這個國家居民——除開金融當局——從外國人那裏的收入與對外國人支付之間的差額。用符號來表示，收支餘額是定義為 $B = R_f - P_f$ 。但是，用另一方式下定義，會更有效果，那就是利用下列事實：居民從另一批居民處得到的收入，是等於居民對居民的支付。把這些收入加在收支餘額上，並從此餘額減去這些支付，收支餘額是轉化為居民總收入與居民總支付間（再次地把金融當局除開）的差額。其符號是 $B = R - P$ 。這是國際收支餘額問題的吸收法之起點。在討論這些問題之中，我將從頭到尾處理收支餘額短缺事例，這是說，居民的支付超過收入。

在我繼續討論政策問題以前，本人認為值得簡略地觀察國際收支餘額短缺的貨幣涵義。短缺意謂居民的支付超過居民的收入，因而，這意味着一件或兩件事。第一個可能，是居民們減少其現金餘額，以致增加貨幣流通速度。在用現金餘額下降方式所資助的短缺下，國際收支餘額短缺將顯然是及時自我校正，蓋因到最後，居民將會把他們的現金餘額減少至零，因而，在這樣做的過程裏，利率將上升，需求將受到限制，出口貨的供給將可能增加，隨而很多要素將會工作，這將趨於改正這一情況。但就現在言，要想貨幣當局能給予此經濟時間，以完成不均衡的改正，是非常不可能的，因為支付超過收入的差額，必須用外國貨幣挹注，而金融當局也許沒有充足的準備，以致容許收支餘額短缺繼續下去，直至它自我改正為止。第二個可能，是貨幣當局經由抵銷的內部貨幣操作，使現金恢復原狀——這是由收支餘額短缺抽出的。倘若金融當局遵循穩定利率的政策，這將會自動發生。於

這一事例中，短缺將不會自我改正；只有在金融當局的政策改變之時，它將會得到改正。

在這一點上歸納起來，國際收支餘額問題意味着，國內通貨供給是受着黃金或外匯準備不充分的支持，或者是此國當局追求一種產生收支餘額問題的政策。在上述任何一種事例中，有跡象顯示，國際收支餘額問題，在本質上是貨幣問題，因而，在根本上，是連結到銀行制度可創造信用的事實。二者都是一個國家的國際準備不充分地支持其國內通貨，因而金融當局用其他內部資產恢復準備，所以都涉及信用創造。

國際收支餘額問題，在根本上是貨幣現象，這是必須永遠牢記在心的重要命題；這是明顯的命題，但常為人忽視。在撰寫有關政策問題以討論「結構性」不均衡與其他觀念之中，已經變成習慣，宛若匯率與其他政府政策，對於收支餘額困難無能為力。在挑選基本因果關係因子或解決型態之中，這種觀念也許有某些用處；但是，它們不能構成嚴正分開的收支餘額問題諸等級。國際收支餘額問題，在根本上恒常是貨幣性的。不過，這並不意謂，這些問題的發生，必可諉諸貨幣管理不善，亦不意謂，在改正收支餘額問題之中，貨幣政策是可用的最合宜政策，或者是最可能有效的政策工具。使用另一方式表達相同觀點，不論一個國家有甚麼問題，如果此問題表現為國際收支餘額問題，則恒常是政府政策的後果；雖然必須承認，於很多事例中，國際收支餘額問題，要比此國的其他問題容易忍受。

讓我們現在轉到國際收支餘額短缺所產生的政策問題上。為着簡化這個論點，我將不包括國際資本交易（除開那些為挹注短缺所需的）；這和中間交易可以消除的事實放在一起，就可容許我們把國際收支餘額看作國內總產出與總支出間的差額。用符號表示， $B = Y - E$ ；為着避免若干困難，把產出與支出看作真實項目而非貨幣項目，將是便利的。

在這些各種假設上，國際收支餘額的短缺，是引起支出大於產出或所得的超額。爲着改正之，一定要支出與所得相等。也許使用而產生這一結果的諸政策，可以分成兩個型態：支出減少政策與支出轉向政策。支出減少政策或總支出的減少，例如使用較高稅率或利率爲手段，影響支出與產出二者。支出是直接受到影響，而支出減少中的一部份，是落在國內生產上，隨而經過乘數效果，更進一步地減少支出與產出。是以，支出減少政策，對收支餘額有兩個效果，用方程式來說：第一個是支出減少的直接效果，這是有利的；第二個是經由較低產出隨而降低支出的誘發效果，只要所得降低所減少的支出數額較小——這是說，只要邊際支出傾向小於一——這將是不利的。起初減少的支出落在進口貨上愈大，則此不利效果將愈小；而且只要邊際支出傾向小於一，支出減少政策的淨效果，必定使收支餘額有所改善。

在我們丟下支出減少政策以前，有更深入的兩點須加說明。一個是支出與產出上的減少，也許會降低國內物價水準，以致引起支出在外國貨與本國貨之間的轉換；我將暫時不討論這一型態的效果。第二個是經由減少此國進口的支出減少，將會促使海外所得作乘數的降低，這隨而將減少外國對這一國家出口貨的支出。這些「外國反響」(“foreign repercussion”)的分析是很熟悉的^⑤，所以，我不在此處詳予解說；只要一切國家的邊際支出傾向小於一，外國反響將只會降低支出減少的有利效果之程度，但將不致使它變爲不利。

讓我們現在考慮其他型態的政策，那就是把支出從外國出產的財貨上，轉換到本國出產的財貨上。這種支出轉向將增加國內產出，而且只要邊際支出傾向小於一（以致支出的增加小於所得），這將改進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餘額。兩種型態的支出轉向

^⑤ F. Machlup,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National Income Multiplier* (Philadelphia: The Blakiston Co., 1943).

政策應予分別，一為貶值——使本國財貨比外國貨便宜，這將趨於把國內支出與外國支出都轉換到國內出產的財貨上；另一種是管制的使用，這些通常是用來限制進口，於此事例中，將有下列趨勢：使國內消費者購買國內代用品；使國內生產者尋求在國內生產進口貨的代替品。是以，進口限制的使用，是趨於把國內支出轉換到國內財貨上——雖然有些時候，進口限制被形容得非常天真，宛若阻止了人民購買外國貨，就會導致他們自動地省下他們原來準備化的錢。為着要刺激出口，也許亦使用管制；於此事例中，其目的是誘導外國人把他們的支出轉向這一國家的產出。

在這兩種型態的支出轉向政策事例中，目的是增加對國內產出的需求。這產生一個疑問，那就是所要求的額外產出，會在何處碰到這一增添的需求。在這一方面，我們一定要在分析上考慮三個可能事例。

在第一個事例裏，有廣泛的失業。於此場合，需求轉向國內產出，將因增加對失業資源的利用，而引起國內產出與所得的增加。第二個事例是這個國家有充分就業條件，但支出轉向政策是受到減少國內需求的政策——支出轉向與支出減少二政策的混合——所支持。在這一事例中，轉向政策可以視為調整的設計，以確保達成國際收支餘額均衡，而不致犧牲充分就業^④；自我降低需求的政策，將趨於導致失業，這因為支出將必須充分削減，才足以降低對進口貨的需求，庶幾乎矯正短缺，這意味着減少對國內產出的需求；因此，要使用轉向政策作為把支出減少全部引向進口貨的手段。為着達成這兩個政策目標——內部與外部平衡，必須要使用兩個政策工具：總需求管制與某種轉向手段。第三個事例，是在充分就業條件下使用轉向政策，但並不用支出減少政

④ R. F. Harrod, 'Currency Depreciation as an Anti-Inflationary Device: Com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XVI, No. 1, February 1952, 102—(6).

策加強之。在這一事例中，需求轉向國內產出將趨於促進膨脹性發展。這就是 Alexander 所分析的事例，他曾顯示，經由真實有效需求的減少，膨脹性後果如何治療支出大於所得的起初超額。本人不擬繼續討論這一情形發生的一切途徑，而只討論較為重要的途徑——雖然我所將提及的論點，是為歐洲條件所設計的，也許不適於低度發展國家。

第一個可能性，是當貨幣所得增加時，實質的稅負將愈來愈高。在這種情形下，政府並不化掉額外稅收，而是累積預算剩餘，這乃是經由增加賦稅漏隙的緊縮效果。第二個可能性，是物價上升也許導致偏向利潤的所得再分配，但若我們假設——這也許不是恒常合理的——企業並不跟着增加其投資，則將會增加實質儲蓄，隨而有支出上的緊縮效果。由於投資是受利潤水準影響，所以這一因子將會怎樣在有利方向中工作，是值得爭辯的。第三個可能性是和第二個可能性有關，那是從固定所得集團中取走所得，重新分配給工資與利潤的賺取人們；這也許會或也許不會減少總消費，取決於上述各集團邊際消費傾向的相對大小，以及所得重分配中工資與利潤分享的途徑。最後，在 Alexander 予以相當大的注意力之可能性中，較高物價有減少貨幣資產真實價值的效果，因而誘使公衆消費較少儲蓄較多。這一效果決定於現金存量，或政府負債數量，後者是其握有人視為資產，但並不為納稅的公衆看作有效的債務，因此，物價水準上升，會使某些資產握有人感到較貧，而沒有使任何人感到較富。就普通私人負債而言，對於升高物價的效果，沒有甚麼可以推論的，蓋因當債權人變得較窮時，債務人在實質上變得較富，因而對支出的淨效果，也許走兩種途徑中的任何一種。

在這一論辯階段，我想說的更深入之一點，乃是於轉向效果以外使用進口限制，也許有直接的支出減少效果。就各種理由——經濟結構，或政府管制——言，為進口貨提供國內代替品，